

中国语文教材经纬

ZHONGGUOYUWEN
JIAOCAIJINGWEI

施 平◎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中国语文教材经纬

施 平 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内容简介

本书从纵向和横向的视角,从中国古代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四书”“五经”到21世纪的新课程实验语文教科书,对我国语文教材的发展轨迹进行了描述和探讨,揭示了语文教材编制和发展的内外因素及客观规律。

本书可作为中小学语文教师研究语文教材的参考书,亦可作为语文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研究生和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专业学习参考读物。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语文教材经纬/施平著.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0. 10
ISBN 978 - 7 - 5640 - 3865 - 6

I. ①中… II. ①施… III. ①汉语 - 教材 - 教育史 - 中国
IV. ①H19 ②G423.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90977 号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 68914775 (总编室) 68944990 (批销中心) 68911084 (读者服务部)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天津紫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 12.75

字 数 / 234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 1 ~ 950 册

定 价 / 50.00 元

责任校对 / 王 丹

责任印制 / 边心超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序

周庆元

施平先生是我们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语文教育专业委员会的理事，从事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的教学与研究时间已经很长，在全国算是一位“少壮派”学者，在广西则是一位“老资格”，现任广西语文教学论研究会的副理事长。我们相交多年，常有来往。令人欣慰的是，这是我们语文教学论的一位坚定的专业守望者。即使长期担任高校行政管理工作，变换过多个领导岗位，从系副主任，到院办主任，到独立学院主要负责人，但是，他始终不离弃，不放弃，一直坚守着这个专业，有一种令人敬佩的专业情结；而且，多年以来，在忙活繁杂琐碎的行政事务的同时，他从不间断地兼做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今天推出的这部《中国语文教材经纬》即是他对我国语文教材的研究成果之一。浏览全书便可得知，作者搜索史料用力之巨，阐释史论用心之勤。

正如《增广贤文》所云：“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鉴往知来”是人类认识与发展自己的必然规律，因此，应当说，语文教材史的研究也是一件很有现实意义的工作。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开展和新的语文课程标准的颁布，一大批新课改语文实验教科书应运而生。这些教科书充满了新的教育理念，呈现出新的气象，推动了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深入发展。但是，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改革的动机与效果并不一致，对新课程新教材的批评意见开始不断涌现。语文新课改充满了批判精神和创新意识，语文新教材也处处追求一种崭新的品格。但新课程新课本给语文课堂带来许多新景观的同时，也带来了“泛语文”“非语文”的指责。为什么知行脱节，事与愿违？个中原因当然可以条分缕析，但，对我国语文教育传统经验包括教材传统经验的总结、研究与传承关注不够，恐怕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罢。

中国的母语教育有几千年的历史，中国语文教材的编撰至少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四书”“五经”和“三、百、千”这些古代的语文教材已然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养育和弘扬民族精神的根基所在和力量源泉。1904年语文独立设科后，各种富有创意的现代语文教科书源源不断，异彩纷呈。蔡元培、林纾、胡适、叶圣陶、朱自清、施蛰存、梁实秋、林语堂等文化大师的

参与或主持，使语文教材保持着与时俱进的先进性和兼收并蓄的丰富性，也积累了语文教材建设的宝贵经验。新中国成立后尽管有“左”的思潮影响，但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汉语文学分科教材到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语文实验教材，都凝聚了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和优秀语文教师的心血和智慧，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因此，从孔夫子到叶圣陶编写的语文教材，乃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各地编制的语文实验教材，都有许多宝贵的传统和现实的经验值得继承和传递。如果把这些都列入了“声讨”和“横扫”之中，我们的语文教材建设岂不是空中起楼阁、沙滩建大厦？

历史是不能割断的，语文教育发展的历史其实就是不断地继承和创新的历史，语文教材的历史也同样是不断继承和创新的历史。为了更好地创新就需要去继承，为了更好地继承就需要去研究历史。而历史研究就是一种爬梳和昭示：爬梳历史经验，昭示历史智慧。历史研究更是一种批判、传承和创新，批判以传承其精华，传承以创新其历史。不入历史则不学无术，疏离历史则背离现实。只有扎扎实实地研究历史，实实在在地借鉴历史，才能确保语文教育改革取得预期的成功，才能推动我国母语教育顺利向前发展。

施平先生嘱我作序，由此生发出以上一些感想，是为序。

（序言作者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语文教育专业委员会会长，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前 言

我和中小学语文教材似乎有一种缘分，20 世纪 80 年代大学毕业时就参加了中学语文教材的改革实验，90 年代在大学又给中文系的本科生开设“中学语文教材研究”的选修课，本世纪初则给硕士研究生开设“语文课程与教材”课。这本书就是根据本人教学笔记的有关部分整理充实而成的。

在语文教材的研究过程中，对许多问题的思考总要追溯其历史的来龙去脉，因此就必然要直接面对过去的语文教材。语文教材应该说是很重要的，小而言之，语文教材是读过的人数最多的书籍，也是对一个人影响最大的书籍之一；大而言之，语文教材反映了不同时代的精神面貌和社会变迁，折射出教育目的、教育价值观、教学方式、学习方式、思维方式等诸多层面的变化。但如此重要的书籍却往往不被重视，中小学毕业了这些书就大都当废品丢弃了，一般的图书馆也不会去收藏这些“小儿科”。也正因为是“小儿科”，过去对语文教材的研究也成果寥寥，大多是教材的评论或者使用的体会之类。新世纪以来，我国展开了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涌现了许许多多新的语文教材，由此也带来了语文教材理论研究的热潮，但是对语文教材的历史进行研究的还较少。为了让研究生更好地掌握语文教材的历史，并从历史的“显露”中理解教材的理论，本人开始了对语文教材的历史研究。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查找中小学的语文教材相当困难，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本书的一个意义也是为了整理提供一份语文教材的史料。

本书属于史论性的著作，但史不全，论不精，只是对语文教材的历史发展线索进行了一些梳理和思考，未敢贸然称为史论，因此，将书名之为《中国语文教材经纬》。感谢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语文教育专业委员会会长，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周庆元先生，他在百忙之中赐赠序言，其中许多赞誉之词，本人受之有愧，但这将是本人在学术上继续前行的巨大动力。感谢先贤时达的研究成果给本人的启示，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参考了许多专家学者的著作，有些未能一一标列，在此表示诚挚谢忱。感谢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有关人员特别是责任编辑张慧峰先生为本书的问世所付出的心智，是他们的辛勤工作，使本书得

以顺利出版。

面对眼前的书稿，我自己仍有许多的不满意之处，错漏也不少。对语文教材历史的研究涉及的问题和领域很多很广，而本人的知识积累和理论素养还难以从容应对这一研究领域。书中许多不完美、不成熟之处，错漏之处还希望得到专家和读者的不吝赐教。

施 平

2010年9月

目 录

绪 论	(001)
第一章 我国古代的语文教材	(005)
第一节 蒙学教材	(005)
一、我国最早的蒙学教材	(006)
二、流传最广的“三、百、千”	(007)
三、古代蒙学教材的发展阶段	(011)
四、古代蒙学教材的启示	(012)
第二节 经学教材——五经	(014)
一、经学教材概述	(014)
二、“五经”教材	(015)
第三节 经学教材——四书	(020)
一、“四书”教材	(020)
二、经学教材的启示	(026)
第四节 文选教材	(027)
一、萧统的《文选》	(027)
二、南宋的文选教材	(028)
三、清代的文选教材	(030)
第二章 我国近代的语文教材	(033)
第一节 晚清的语文教材概况	(033)
一、教科书名称的由来	(033)
二、我国最早的语文教科书	(033)
第二节 20 世纪初期语文教材概况	(038)

一、语文独立设科	(038)
二、小学国文教科书	(039)
三、中学国文教科书	(041)
第三节 民国初年的国文教科书	(043)
一、小学国文教科书	(044)
二、中学国文教科书	(046)
 第三章 我国现代的语文教材	(049)
第一节 五四时期的语文教科书	(049)
一、白话文进入语文教材	(049)
二、中小学国语教科书	(051)
三、新学制语文课程标准	(054)
四、新学制语文教材	(055)
第二节 20 世纪 30 年代的语文教材	(066)
一、中小学国语、国文课程标准	(067)
二、课程标准教科书	(071)
三、《国文百八课》	(082)
四、国定本语文教科书	(087)
第三节 20 世纪 40 年代的语文教材	(091)
一、中小学修正国语、国文课程标准	(091)
二、部编语文教科书	(098)
三、“文”“白”教材的处理	(099)
四、近现代语文教材的发展特点	(101)
第四节 解放区的语文教材	(103)
一、从苏区到解放区的语文教材概况	(103)
二、陕甘宁边区的《中等国文》	(105)
 第四章 我国当代的语文教材（上）——归于一元的语文教材	(107)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语文教材	(107)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	(107)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小学语文教材	(112)
第二节 汉语文学分编的语文教材	(118)
一、汉语文学分科的由来	(118)
二、汉语文学分科教学大纲	(119)
三、汉语文学分编教材	(122)
四、汉语文学分科的经验教训	(124)
第三节 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的语文教材	(125)
一、“大跃进”的语文教材	(125)
二、20 世纪 60 年代前期的语文教材	(127)
三、“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语文教材	(135)
 第五章 我国当代的语文教材（下）——走向多元的语文教材	(139)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后的统编语文教材	(139)
一、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	(139)
二、中小学通用语文教科书	(144)
三、分编型重点中学课本	(147)
第二节 新时期“一纲多本”的语文教材	(152)
一、改革实验的语文教材	(152)
二、审查通过的初中语文教材	(156)
三、高中语文实验教材	(161)
第三节 21 世纪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的语文教材	(164)
一、语文课程标准对教材的要求	(164)
二、新课标小学语文教材	(168)
三、新课标初中语文教材	(172)
四、新课标高中语文教材	(179)
五、新课标语文教材的得失	(187)
 参考文献	(191)

绪 论

在以信息化、全球化和个性化为特征的 21 世纪到来之际,我国开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这次课程改革给语文教育带来了新的课程理念、课程标准、教学方式和评价体系。根据 2001 年教育部颁发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提出的课程改革的方向、指导思想、总目标和具体要求,《语文课程标准》与其他 17 个学科的课程标准同时颁布。《语文课程标准》既体现了语文课程改革的新理念,也体现了新课程的新价值取向。根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和《语文课程标准》,一批新课程语文教科书应运而生。

课程改革可分为理念层面、教材层面和实践层面三个层次。课程改革的新理念和新价值取向必须要通过教材层面这一中心环节才能进入一线教师的课程实践,因此教材的质量如何关系到课程理念的落实和课程改革的质量。任何课程改革成功与否最终取决于课程的实施即教学,而对教学起决定性作用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教材。

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作为学校教育的核心环节,集中体现了国家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是学校教师开展教学和组织学生活动的最主要的依据。它制约着学校教育的主要活动方式,影响着学生身心发展。综观中外教育改革,无不把课程教材改革放在突出位置上。特别是近年来,世界许多国家,无论是反思本国教育存在的弊病,还是对教育提出新的目标和要求,都是从课程教材改革入手的。通过课程教材的改革,来调整人才培养目标,改变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这些国家都把基础教育课程教材改革作为增强国力、积聚未来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措施加以推行。因此世界各国的课程改革无不是以教材的改革更新为标志,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八次课程改革也如此。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80 年代,我国的教材制度为“一纲一本”的国定制,全国中小学统一使用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出版的教材;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我国教材制度由国定制改为审定制,可选用经过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通过的六套规划教材,初步形成了“一纲多本”的局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原有的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已不能完全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为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

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教育部决定大力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教材改革，调整和改革基础教育的课程教材体系和内容，构建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体系。在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背景下，我国教材的编审体制、出版发行体制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确定了中小学教材建设实行在国家基本要求指导下的教材多样化方针，由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规划组织编写教材改变为由教材编写单位向教育部申请编写立项，鼓励有能力的单位、团体和个人依据国家课程标准组织编写高质量、有特色的教材，特别鼓励编写适合农村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使用的教材。

在我国教材编写、审定、出版、发行、选用体制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的利好形势下，语文教材的编写出版出现了繁荣的局面。根据教育部制定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和新的语文课程标准精神编写的九年义务教育阶段语文教材就有“人教版”（人民教育出版社）、“苏教版”（江苏教育出版社）、“语文版”（语文出版社）、“沪教版”（上海教育出版社）、“鲁教版”（山东教育出版社）、“北师大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浙教版”（浙江教育出版社）、“赣教版”（江西教育出版社），等等，高中语文教材则有“人教版”“粤教版”（广东教育出版社）、“沪教版”“语文版”“苏教版”，等等，百花齐放，异彩纷呈。教材的多样化有利于通过竞争提高教材编制的质量，同时也便于全国不同地区、不同学校根据实际选用更加适应本地区本学校的教材。

这些教材体现了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精神，紧扣语文课程标准的新理念，以学生的语文生活经验和成长需要为依归，改以学科旧有知识为中心为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着力培养人文精神，提升文化品位；增强综合性实践活动，密切联系生活，关注个体经验，有利于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地学习，着力培养创新思维和创造精神，追求对学生进行语文素养的综合培养。此外，新的语文教材更新课程内容，引进现代信息，强调学科的外部联系和内部融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但是，正如有专家所指出的，新课标给语文课堂改革带来许多新景观的同时，也导致“泛语文”甚至是“去语文”“非语文”的倾向，这些问题归结到一个根本点是对我国语文教材传统经验的承传关注不够。（周一贯：在千年视野内寻找语文教学的传统[N]．中国教育报，2008.1.17.）新课程教科书编写的时间相对比较仓促，对新课标的理念和目标的转化还处于探索阶段，如何正确处理继承和创新的关系也在摸索之中。我国传统语文教育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明的一部分，千百年来哺育了中华民族的世代儿女。20世纪初语文独立设科后，我国的语文教育逐渐割断了传统语文教育的血脉，采用西方语文教育的模式和套路。经过百年的历程，至今语文教育的效果并不理想。我国著名的语文教育理论家张志公先生也曾指出我们语文教育存在的问题原因“有一个非常重要之点，即没有足够的重视传统，正确的对待传统。”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语文教育发展的历史其实就是不断地继承和创新的历史，语文教

材的历史也同样是不断继承和创新的历史。“语文教学的改革如果没有传统经验作基础,它就是没有生命的;传统经验如果得不到科学的分析和改造,它就是没有前途的。”(章熊·思索·探索——章熊语文教育论集[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369)对于有着几千年历史,又担负着传承民族文化薪火的神圣职责的语文教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继承比创新更为重要,或者说,继承就是创新的一个有机部分。

社会学家已经指出,一个良性的文化建构,是“前塑型文化”(以未来为目标的文化)、“同塑型文化”(以同时代需求为目标的文化)与“后塑型文化”(以过去传统为资源的文化)相互作用的社会文化过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仅仅有了经济建设就可能完成的,还要有文化软实力的建设。而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是离不开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的。过去是未来的财富,未来是过去的延续。当下我们的社会不乏革命反思和体制创新的冲动,但作为现代社会的“底色”并还时时起到主导作用的仍然是传统文化。传统语文教育就是这样一种传统文化,影响着现代语文教育。我们在改革时都要首先面对传统,应该张扬其积极影响,屏蔽其消极影响。尽管我们走进了一个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但语文教育的现代化如果没有传统语文教育的经验作基础就没有生命力;传统语文教育的经验如果得不到科学的理性思考与分析,就不可能得到应有的继承发展。分析传统语文教育的经验与教训,继承传统语文教育的优秀传统,对汉语语文教学本身的内在规律进行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改革语文教学,开创出一个语文教学的新局面来。

对传统语文教育的研究最重要的是对语文教材的研究。因为对传统语文教学的研究我们主要从历史文献中进行。语文教育的历史文献最多的就是教材,教材反映了教学的目的、原则、内容、方法等,是反映教学情况的第一手材料。张志公先生就说过:“说实在的话,研究历史上的语文教育,求之于教材往往比求之于史传记载的章程、条例更可靠可信一些。教材是实际使用的,而其余往往是做出来的文章,说得头头是道,但与实际不见得相符。”(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3)自教育产生之日就有教材。万世师表孔子是教育的祖师,是教材编写的祖师,也是语文教材编写的祖师。语文教材编写了几千年,也积累了众多的语文教材以及编写语文教材的经验。这份宝贵的遗产是值得我们研究传承的。鲁迅先生在《我们是怎样教育儿童的》一文中就希望“有人作一部历史,将中国历史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作一个明确的记录,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的被熏陶下来的”。(《鲁迅全集·准风月谈》)张志公先生在这个方面做了一项开辟性的工作,他在20世纪50年代就对传统语文教材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撰著了《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一书,至今,这本书仍然是研究传统语文教育的经典。在该著作中,张志公先生从语文教材入手研究传统语文教育,因此对蒙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专门附录了蒙学

书目稿,为后人研究蒙学教材积累了宝贵的财富。今天,在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守护文化与文明的基本价值的时代呼唤下,我们更应该去深入全面地研究中国语文传统教材,以指导我们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为培养具有人文素质和科学精神的一代新人作出贡献。

自从1904年语文独立设科以来,编辑出版的语文教科书的数量远超过了中小学其他学科的教科书,但是对语文教材的研究却为数不多,质亦不高,且不少还是处于经验的、感性的层面。在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的研究当中,对语文教材的研究也不如对其他内容的研究那么广泛和深入,不少的研究大多也只是关于教科书编写的散论、心得或某种教科书的单向研究。可以说目前的教科书研究存在着三类缺失:①理论上的缺失,直至现在为止,缺乏详尽而公认的教科书理论;②经验上的缺失,对师生在课堂上或课外应用教科书的情况知之甚少;③方法上的缺失,目前仍未能设计出一套可信的探究方法和工具,亦未能发展出一套必要的分类方法。因此,语文教育家朱绍禹先生曾说,我们只有教材评论,而没有教材理论。应该说,语文教材研究的滞后阻碍了语文教科书的建设,更无法为语文教科书的编写实践提供理论和方法的支持。因此,对语文教材的理论研究关系到课程改革的深入与成功。

任何研究都离不开历史研究。语文教材研究的思想保存于教材编制的历史中,不入历史,则不学无术。朱绍禹先生说:“语文教科书的历史,就是基础教育的历史。也几乎可以说,语文教材特别是语文教科书是代表人类历史文明的象征之一,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朱绍禹.中学语文教材概观[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2)研究语文教育的历史就是从研究语文教材入手的。因为古代语文教学的情景历史记载很少,但却留下了不少的语文教材。考察研究语文教材的历史发展,可以发现我国语文教育的方法规律,发现我国语文教材的发展规律和脉络,从而可以给我们当今的课程改革和教材编制提供有益的启示。

语文教材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语文教材指课堂上和课堂外教师和学生使用的所有语文教学材料,甚至一切对人们的语言行为产生影响的口头的、书面的材料,如报纸、杂志、报告、演说等都可列入。狭义的语文教材则专指语文教科书,即语文课本。我国古代没有独立的语文课程,因而也就没有专门的语文教科书,或者说只有综合性的语文教科书。本书研究的古代语文教材主要是儿童和青少年学习所用的蒙学教材和科举考试所用的四书五经以及一些常读的文章选集,这些都是语文学习的教材,近于狭义的语文教材。从语文独立设科之后,本书研究的教材特指教科书,即狭义的教材,对教师用书、练习册、课外读本、辅导资料之类不列入本研究范围。

此外,本研究仅限于我国大陆的语文教材,对港、澳、台的语文教材由于缺少第一手资料,暂未列入研究范围。

第一章

我国古代的语文教材

我们这里所说的“古代”是指从远古至 19 世纪，古代语文教材就是指这一期间的语文教材。1904 年晚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后，标志着语文学科开始走上独立设科的道路，语文教育进入了近现代阶段，语文教材也同样进入了近现代阶段。

中国的启蒙教育开展得很早，在儒家经典中就有许多有关“小学”的记载。如《礼记·王制》就有“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的说法，《大戴礼记·保傅》则说：“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尚书大传》中也说：“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嫡子，年十三入小学，见小节而践小艺；年二十入大学，见大节而践大义。”这就说明了一个相对于大学教育的小学教育的存在。

中国古代教育是一种综合教育，或者说是一种“泛语文教育”。“语文”不独立设科，而是纳入到综合教育的整体格局之中。因此，也就没有独立的语文教材体系。古代教材，多数是集多方面教育为一体的“泛语文教材”。按张志公先生的观点，我国传统语文教育大体上由三个阶段构成：首先是启蒙阶段，以识字教育为中心；其次是进行读写的基础训练；最后是进一步的阅读训练和作文训练。（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初探》[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对应这三个阶段，我国古代语文教材大致可以分为蒙养教材、经学教材和文选教材三类。

历经两三千年的淘洗，留下了一批对语文教育产生过很大作用的教材范本，我们下面介绍一部分有代表性的语文教材。

第一节 蒙学教材

中国封建时代把对儿童进行的初始教育称为“蒙养”，或“发蒙”，所用的教材就是蒙养教材或蒙学教材。也就是儿童教材。历代的蒙学教材数量很大，类别也很杂，张志公先生的《古代语文教学初探》一书中就专门附有蒙学书目稿，编录有 619 种。我们在这里仅撮其要而论之。

一、我国最早的蒙学教材

学习语文从识字和写字开始，识字和写字是对儿童的一种基础训练。因此我国最早的儿童教材特别注意识字和写字的教学。儿童只有掌握了文字这个工具，才能逐步掌握各方面的知识，开拓认知领域，并且才能够按照当时社会的要求，接受道德、伦理、政治等各方面的所谓“化民成俗”“成德达材”的教育。因此，我国最早的儿童教材，主要是字书一类的读物。

据《周礼·地官·保氏》记载：“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当时，保氏（官名，掌管教育）以六艺教国子（公卿大夫的子弟），而六书是六艺之一。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所谓“六书”按照《说文解字》作者许慎的说法是指：象形（如日、月）、指事（如上、下）、会意（如武、信）、形声（如江、河）、转注（如考、老）、假借（如令、长）。古人认为六书是造字之本，因而识字就需要先学六书。实际上，古人并不是先定出六书的原则后才造字的。文字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创造文字的并不是某一个人，不可能事先定好原则再去造字。六书只是后人根据汉字的实际情况加以客观分析所得出的结论。这种分析是合乎汉字字理情况的，它是汉字创造和应用的逻辑结果。在上古时代，人们能够作出这样的分析是非常难得的。正是因为这种分析是合乎汉字字理的，所以在识字教学上能起到良好的作用。周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据《汉书·艺文志》说是“周时史官教学童书”。因此有历史记录的最早的一部识字教材是《史籀篇》。籀文是古代一种字体，即大篆。周宣王时代（前827年—前782年）《史籀篇》是太史教授儿童识字的课本，但此课本未能流传下来。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推行“车同轨，书同文”政策。秦代为了统一和简化汉字，改用小篆编写了三种字书，即李斯作的《仓颉篇》、胡毋敬作的《博学篇》和赵高作的《爰历篇》作为儿童识字课本。到西汉时，《仓颉篇》等三本识字课本合称“三仓”，改为隶书，原书已佚。

两汉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语文规范化等方面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识字教育被提到了很重要的地位。据王国维考证：“汉时教初学之所名曰书馆，其师名曰书师，其书用《仓颉》《凡将》《急就》《元尚》诸篇，其旨在使学童识字习字。”（《汉魏博士考》，《观堂集林》卷四）汉代新编的识字课本，计有司马相如《凡将篇》、史游《急就篇》、李长《元尚篇》、扬雄《训纂篇》和贾鲂《滂喜篇》，可见当时对语文规范、识字教育的重视。只是仅史游的《急就篇》流传下来（现有《四库丛刊》本），《仓颉篇》有残简，其他都亡佚了。

《急就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蒙养教材，为西汉时期史游所作，约写成于公

元前40年。史游生卒年和生平事迹不详，汉元帝时曾任黄门令，精字学，善书法。关于“急就”二字的意思，宋人晁公武是这样解释的：“杂记姓名诸物五官等字，以教童蒙。‘急就’者，谓字之难知者，缓急可就而求焉。”现在看来，“急就”二字并不是指“字之难知”，而是“速成”的意思，说明这是一本速成的识字课本。

汉魏以后一个时期，主要用《急就篇》作为儿童教材。据史书载，晋夏侯德曾读《急就篇》；北魏太宗命臣解《急就章》；刘芳撰《急就篇续注》三卷；北魏崔浩一生书写《急就篇》以百数计；刘兰始入小学，学写《急就篇》；李绘六岁还没有入学就学写《急就篇》了；李铉九岁入学，一个多月就学会写《急就篇》了。可见《急就篇》作为儿童教材的时间是很长的，到唐代以后才逐渐衰微。

《急就篇》共34章，共2144字，据前人考证，最后的128字是东汉人补加的。全书尽量避免重复字，尽量使每句话都表达一定的意义，并且教给儿童一些常识。大致是把当时常用的单字编集起来，分类编成韵语，有三言、四言、七言韵语，多为七言；三言、四言隔句押韵，七言则每句押韵，非常利于记诵。《急就篇》所选用的字，反映了秦汉的社会生活，有很大的史料价值。

《急就篇》不仅仅是识字教材，也是一本常识教材。充分体现了我国语文教材的综合性特点，也反映了语文教材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的特点。全书编成三部分：一是“姓氏名字”，400多字包括了100多个姓；二是“器服百物”，1100多字，包括400多种器物，100多种动植物，60多种人体部位器官，70多种疾病和药物的名称；三是“文学法理”440多字，包括官职名称和法律知识等。由此可知，教材所体现的自然及社会知识非常丰富。儿童通过学习，不只是识字，还可以获得当时历史条件下比较全面的生产及生活所必需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急就篇》能完整流传下来，唐代颜师古功不可没。颜师古改正了《急就篇》流传中出现的讹误，系统整理，并精心为之作注，使这部令初学者博闻广识、开阔视野的重要典籍得以流传至今。

二、流传最广的“三、百、千”

蒙养教材中流传最广、最久，影响最大的是“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三、百、千”中最早出现的是《千字文》，也是“三、百、千”中唯一确切知道成书时间和作者的一部书。据说是南北朝时梁武帝从钟繇、王羲之书中拓取一千个字，命周兴嗣编为韵语。由于《千字文》内容精、文辞美，加上是皇室用书，知名度高，所以，《千字文》渐渐地成为《仓颉篇》之后，又一突出的童蒙读物。顾炎武说：“读者苦《三仓》之难，便《千文》之易，于是至今为小